

中缅边界谈判研究

关培凤

【摘要】中缅边界谈判是在两个新独立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进行的,也是在中国面临国际环境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展开的。从1954年缅甸首先提出边界问题到1960年10月《中缅边界条约》签订,中缅之间的边界谈判经历三个阶段。中缅边界谈判的成功一是因为两国都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二是中国在边界谈判中较好地照顾到了缅甸的利益。作为中国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范例,中缅边界谈判的成功带动了一批邻国与中国友好解决边界问题。

【关键词】中缅;边界谈判;范例;意义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1—0163—06

【作者简介】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430072

缅甸自独立以来,一直非常关注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希望从英国继承下来的边界能得到中国的承认。在英国殖民侵略扩张背景下形成的中缅边界,既有历史遗留的未定界,也有令中国蒙受重大损失的已定界。因此,中国政府对中缅边界问题始终持谨慎态度。国民政府在1948年就已拒绝继续根据1897年中英边界协定接受南畹指定区(即勐卯三角地)的一千卢比年租金,并通知缅甸政府要取消南畹指定区的“永租”。^①1948年7月国民政府立法院的一份报告也呼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②但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根本无暇与缅甸进行边界谈判。因此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仍存在三段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北段尖高山以北的未定界问题、中段勐卯三角地的“永租”问题和南段“1941年线”问题。本文立足我国外交部相关解密档案,在分析中缅边界谈判背景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中缅边界的谈判历程,并就中缅边界彻底解决的意义和影响进行论述。

—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缅边界谈判一直被看作是中国与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范例”而倍受推崇。要真正理解中缅边界谈判在边界谈判史上的重要地位,必须对中缅边界谈判背景有深入了解。

首先,中缅边界谈判是在两个新独立的且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进行的。缅甸与中国同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缅甸于1950年6月8日即与我国正式建交,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最先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早在1951年中缅文化代表团就进行了互访,1952年两国分别成立了中缅友好协会和缅中友好协会,并在随后几年里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大大增进了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③1954年4月22日和11月3日,中缅两国先后在仰光 and 北京签订贸易协定与缅甸大米同中国出口商品换货议定书。^④1954年6月,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1960年5月20日,档号105—01428—03。

② 引自:Daphne E. Whittam, “The Sino - Burmese Boundary Treaty,”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 (Summer, 1961), p. 175, 注释3。

③ 陈炎:《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世界知识》1954年第22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贸易谈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4年第2期。

共处五项原则。同年12月吴努总理访华期间,双方达成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开辟两国间的航空线、恢复两国间的公路交通并缔结两国间的邮电协定以及商品换货等协议。^①1955年10月,两国在仰光签订了中缅民用航空运输协定,1956年4月正式通航。^②1956年,宋庆龄副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缅甸以及吴巴瑞总理、吴努主席等访问中国。当年12月15日至17日,中缅两国还在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市芒市镇举行两国总理和副总理亲自参加的边民联欢大会。中缅之间的边界谈判正是在这种友好关系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次,中缅边界谈判在中国处在国际环境极为恶劣的形势下展开。新中国成立时,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美国拒绝承认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还在国际上阻挠一些国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支持台湾当局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援朝抗美使中美关系完全对立,为了孤立、封锁和扼杀新中国,美国扶植日本,并纠结多国拼凑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制造和策划针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扩军备战。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邻国大多是刚刚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特别是与中国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国家,往往怀疑中国对其有领土野心。1954年底,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时曾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吴努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反映了周边一些小国的心声。中缅边界谈判期间,中国的周边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也使中国遭受了额外的压力。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逐渐从联苏反美转向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1959年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日益凸显,中印边界冲突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缅甸进行的边界谈判不单纯是要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更要考虑突破美国对华封锁和包围、安定四邻,打开外交局面,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等问题。

再次,中缅边界正式谈判是在黄果园事件发生后举行的。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李弥部队越过了“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同时,缅甸军队也在南北两段未定界上抢先占据有争议的地方。^③1955年11月20日,中缅双方的边防部队在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巡逻时由于误会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紧张了起来。1956年7月,在缅甸非常有影响力的亲美的《民族报》披露了这一事件,并开辟专栏,呼吁公众注意所谓中国“侵略”的事实和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边境问题^④。美国借黄果园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扩张”,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黄果园事件及其引发的不利于中缅友好关系和中国形象的消极态势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建国伊始确定的维持现状的边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修改此前作为权宜之计的边界政策,中缅进行边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上述背景下,中缅两国领导人从1956年开始通过公文往来和友好互访,正式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和沟通。而中缅同为新独立的友好国家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造成的严峻挑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对中缅边界谈判所持的立场和原则,也影响到了中缅边界谈判的进程。

二

中缅边界谈判的整个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缅边界谈判的提出和原则上达成一致的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至1956年11月上旬吴努主席访华。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缅甸时,吴努总理在双方最后一次会谈中表示了希望能早日解

① 逸:《中缅两国友谊的进一步加强》,《世界知识》1954年第12期。

② 徐军:《缅甸——我们的亲密邻邦》,《世界知识》1957年第1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周恩来总理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话纪要》,1956年8月25日,档号:105—00307—03(1)。

④ Richard J. Kozicki, “The Sino - Burmese Frontier Problem,” *Far Eastern Survey*, Vol. 26, No. 3 (Mar., 1957), p. 33.

决边界问题的愿望。^①同年底吴努总理访华,双方第一次就边界问题全面而认真地交换了意见。会谈中,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对未定界的认识。缅方认为只有北段是未定界,而中方则认为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②尽管存在不同认识,会谈还是取得很大成效。12月12日,中缅发表联合公报,明确指出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中缅两国首次公开表示要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悬案。

1955年黄果园事件的发生及其引发的不利形势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要加快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步伐。从1956年初开始,中缅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缅甸多次致信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1956年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就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具体方案指出:中国承认南段的1941年线有困难,但仍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缅甸军队也应从片马、岗房、古浪这三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双方军队撤走后,另一方的军队保证不进入撤出的地区。^③1956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吴努访华,周总理与吴努进行了四次会谈。其间,周恩来向吴努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三点原则性建议:第一,英国强加于中国的“1941年线”已成为事实,应该作为双方全盘解决边界问题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在边界问题取得最后协议,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得进驻中国军队所撤出的地区;第二,自尖高山至伊索拉希山口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原则上应归还中国之外,边界线应沿着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怒江)之间的分水岭;自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中缅边界则遵循传统习惯线;第三,双方同意取消缅甸对勐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由两国政府就如何取消的问题进行协商。^④这些照顾到了双方利益的公正建议赢得了吴努的赞赏,他表示:“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合理的方案,我非常满意。”^⑤至此,双方领导人对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为中缅双方就具体问题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中缅就具体问题进行反复谈判的时期,即从1957年2月吴巴瑞致函周恩来至1959年6月奈温总理向中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1957年2月4日,缅甸总理吴巴瑞致函周总理指出,缅甸应移交给中国的片马、岗房和古浪的面积为56平方英里,该信并附有一份表明英国遗留下来的缅甸联邦的全部边界的地图,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承认。^⑥对此,周恩来在3月底与正在云南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谈判时指出,考虑到当地人民和行政的方便,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的面积应比缅方所建议的大;为照顾缅甸的交通方便,中国不准备收回勐卯三角地,而希望以此交换“1941年线”划归缅甸的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居住的区域。中国也乐意放弃根据1941年协定参加经营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⑦吴努对此表示这同他此前对解决方案的理解有出入,他要求周恩来对吴巴瑞2月4日的来信给予正式答复。

1957年7月26日,周总理对吴巴瑞的来信作了正式答复。复文有三张附图,分别画出了伊索拉希以西的传统习惯线、中国提议应移交的片马、岗房和古浪的面积以及中国提议与勐卯三角地交换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周恩来对中国政府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具体意见进行了说明。第一,北段伊索拉希和尖高山之间的边界线,除片马、岗房、古浪三地应归还中国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则以附图一标明的传统习惯线为界;片马、古浪、岗房三处的面积,中国提出如附图二

① 姚仲明等:《周恩来总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光辉业绩》,见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2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74页。

④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77页。

⑥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⑦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所示的具体建议(约183平方英里);第二,中国同意在瓦邦的边界应沿“1941年线”划定,并加以调整,使附图三标明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区域(86平方英里)得以移交给中国。第三,如果缅甸同意这些调整,则中国准备把勐卯三角地永久地移交给缅甸。周恩来还强调,这些方案应被当作一个整体方案来看待。^①即缅甸不能接受其中一部分意见而不接受其他意见。如果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将放弃根据1941年中英换文的规定而享有的经营炉房矿产的权利。

然而,缅甸坚持吴巴瑞2月4日信中所提的意见,既不同意增加应归还片马三地的面积,也不同意以班洪、班老在“1941年线”以西的区域与勐卯三角地交换。当年12月,吴巴瑞总理和吴叫迎副总理在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中表示,他们的印象是“如果缅甸同意放弃片马、岗房、古浪,中国是会把南畹指定区割让给缅甸的,同时边界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了”。他们认为中国以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班老,是提出了新的问题。^②周恩来指出:第一,中国从未同意放弃南畹指定区以交换片马、岗房、古浪,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中国的,缅甸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对这两个区域的要求有其法律基础;第二,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和古浪的面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第三,中国提议以南畹指定区交换“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两个部落的辖区;第四,最北端的传统习惯线,除独龙江流域外,大体应沿分水岭予以勘察和确定,但在一定地方,为照顾分水岭以北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边界可能离开分水岭。第五,为确定传统习惯线,应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对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的中缅边界进行勘察,并逐步解决应交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和古浪地区的问题以及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班老在“1941年线”以西辖区的问题。^③

1958年2月,缅甸内阁外交小组委员会对上述方案讨论后,要求吴拉茂继续在北京促请中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分水岭原则和吴巴瑞此前所提的片马三寨的面积,并向中国政府提议,如果中国难以无条件放弃南畹指定区给缅甸,则继续现存的“永租的安排”。^④7月30日,周恩来在致吴努的信中对此作了回应,除坚持在与吴巴瑞和吴叫迎讨论中的立场外,还希望缅甸重新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永租”的具体办法。^⑤由于随后不久缅甸发生政变,中缅之间的谈判被暂时搁置,直到1959年6月奈温总理才向中国提出了新的方案。第一,除独龙江流域外,在伊索拉希至印度边境之间的边界应无任何保留地以分水岭为界;第二,应交还中国的片马三地的面积为56平方英里;第三,以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班老在“1941年线”以西的区域(约为62平方英里)。除因移交班洪、班老区域给中国所需作的调整外,“1941年线”应由双方予以接受;第四,中国应放弃根据1941年换文参加经营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⑥奈温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缅甸方面确认以南畹指定地区交换“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这就使中缅双方的主张更接近了一步。但在最北段的传统习惯线和片马三地的面积问题上,缅甸仍坚持此前的立场,故中国政府对该方案并没有很快予以答复。

第三阶段是中缅边界谈判的完成期,即从1959年10月周恩来答复奈温总理的新方案起至1960年10月中缅边界条约签订。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边界先后发生的冲突事件引发了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所谓中国“侵略”的恶毒攻击,为了尽可能消除周边小国的疑虑,以事实证明中国的和平诚意,中国政府加快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步伐。9月4日,中国政府对奈温的提案作了答复,建议双方以中国政府1958年7月30日和缅甸政府1959年6月4日的方案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由两国政府委派代表团进行讨论。这一答复打破了中缅两国在边界谈判中的僵局。11月4日,奈温复函周恩来时指出,他所提的方案是缅甸可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折中方案,比缅甸此前的任何方案都要更进一步,因此他主张不把问题交由两国代表团协商,而希望能亲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边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89—1190页。

②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③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④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6页。

⑥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界问题。^①中国对此积极回应,12月22日,周恩来致函奈温,正式邀请他于1960年1月间来华访问,“就如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进行原则性的商谈,以推动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和解决。”^②

1960年1月23日,奈温总理率团访华。为促成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周总理在1月25日与奈温总理的会谈中调整了此前坚持的对传统习惯线先勘察再确定分水岭原则的立场,建议“在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③中国所作的进一步努力和中缅之间的坦率会谈取得了良好的结果,1960年1月28日,中缅双方签订了边界协定,满足了缅甸所坚持的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边界,除绕过独龙江流域者外,应沿着分水岭的主张;且遵循了缅甸提出的先确定以分水岭为界再对传统线进行勘察的要求。协定同时规定应交还中国的片马三地的面积,由边界联合委员会商谈确定;缅甸以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交换勐卯三角地,其具体面积则参照中缅分别在1957年7月26日和1959年6月4日用地图标明的建议,建议中互相一致的地区划归中国;有出入的地区则由联合委员会派员实地查明该地区是否属于班洪部落管辖,以便确定该地区是否移交中国。协定签订后,中缅双方又就未尽事宜作了进一步的交涉,1960年10月1日,《中缅边界条约》签订。根据条约,缅甸向中国移交的片马三地面积约59平方英里;划归中国的“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面积为73平方英里,比奈温方案中的提议面积增加了11平方英里。尽管这一面积仍小于中国最初所主张的86平方英里,但对缅甸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班老矿藏丰富,而南畹三角地没有什么出产,由于珊邦的孟密至八莫的公路快要完工,即使把三角地交回中国,也不会影响珊邦和克钦邦之间的交通。”^④缅甸作出这一让步,很可能是出于对中国在片马三地面积上态度宽容的回报。吴努曾说,“中国在同意接受片古岗近59平方英里的面积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谅解’”。^⑤在中缅边界谈判的最后阶段,中国为了推动中缅边界彻底解决作了最大的努力。

从1954年夏缅甸首先向中国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要求,到1960年10月中缅边界条约正式签订,中缅双方为彻底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前后历时6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交涉和谈判,最终使这一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从而揭开了中缅关系友好发展的新篇章。

三

中缅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决心,坚持友好协商的立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准备与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⑥同中国一样,缅甸也始终坚持和坚信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吴努在1956年8月8日向报界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表示,他相信中缅之间的边界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8月28日,吴努又对《民族报》记者说,他十分相信中缅边界问题“是一个能够处理的问题,是一个能够同中国以友好精神来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把它提交联合国或者邀请其他亚洲国家作为观察员前往缅中边境。他认为面对面的会谈可能找出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⑦正是中缅双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为问题的最终彻底解决奠定了基础。

①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档号:105—01428—0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周恩来总理给缅甸总理奈温复信邀请其访华商谈中缅边界问题》,1959年12月22日,档号:105—00385—02(1)。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缅甸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庆祝中缅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公布的活动》,1960年2月11日—1960年3月25日,档号:105—00681—02(1)。

⑤ 《周总理给缅甸总理奈温复信邀请其访华商谈中缅边界问题》,1959年12月22日,档号:105—00385—02(1)。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⑦ 《吴努最近言论摘要》(中缅问题参考资料之八,外交部新闻司编,1956年10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缅甸政界要人吴努言论摘要》,1956年10月1日—1956年10月31日,档号:105—00446—04(1)。

中国从自身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在中缅边界谈判中较好地照顾到了缅甸的利益,也是中缅边界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缅边界谈判时,中国不仅面临着迫切的建设任务,而且在国际上受美国的封锁和包围,谈判期间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外交上的困难。为了打开外交局面,争取国际形势与周边安全形势的和缓,中国在与缅甸的边界谈判中始终秉持宽宏大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对缅甸作了一些让步。如在中缅边界北段传统习惯线的确定方式上,中国最初是主张先进行实地勘察再确定分水岭原则;在应交还中国的片马三地的面积问题上,中国最早主张应归还的面积为183平方英里,但在随后的具体谈判中,中国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国家团结的利益出发,为推动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在这两个问题上大部分满足了缅甸的要求。吴努在1960年8月的国会演讲中,“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友好态度表示欣赏”。缅甸苏敏上校在中国组织的庆祝中缅签订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的大会上也指出,“边界问题的签订表明了中国对我们缅甸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也表现了对我们缅甸的体谅。”^①这也证明中缅边界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是与中国对缅甸的宽宏大量和体谅让步分不开的。

中缅边界谈判长久以来被作为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缅边界谈判检验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中缅边界谈判是中国与邻国进行的第一次边界谈判,谈判中所遵循的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中缅边界条约的最终签订充分证明,即使是像边界争端这样复杂的问题,即便是社会制度和大小强弱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的。二是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确立了我国对过去旧的边界条约和历史资料的态度,即对旧中国过去同外国所签订的边界条约,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承认和尊重,如果要修改或调整,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在边界历史资料和地图的运用上,要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而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还要注意本国与对方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②正确客观地对待旧的边界条约和历史资料,对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缅边界条约的顺利签订,全面彻底地解决了中缅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不仅使中缅边境的居民能够得到安宁,而且也有利于中缅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缅举行边界谈判时,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大肆宣传中国不会与小小的缅甸解决边界问题,不会与缅甸签订边界条约,因此,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与周边小国解决边界问题时,始终奉行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展示了自己的和平诚意和对其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遵守。在中缅边界问题顺利解决的带动下,周边国家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随之上升,先后同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要求。中国政府抓住时机,运用解决中缅边界的成功经验又顺利地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周边外交关系和安全形势,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外交能力。

(责任编辑:张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国方面在边境地区组织庆祝中国、缅甸签订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的活动》,1960年2月24日—1960年5月14日,档号:105—00681—01(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7—238页。

Financial Turbulence in Political Variation: On the Bank Runs of Peking and Tianjin in 1928

ZHANG Xiu – li

On December 10, 1928, the Exchange Bank of China (jointly run by China and Japan) announced to close for a month for reorganizing and reshuffling. This finally gave rise to bank runs in Peking and Tianjin including Warwick Bank, Mongolian and Tibetan bank,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Bank Of China, Chinese – 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 etc. The indifference of government and lack of support from other banks made these small or middle size banks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the wave of bank runs. A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 was that the wealth of many check bearers vanished in a flash in the chaos of the market.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Focusing on the handicraft transformation in Cixi county (1953 – 1956)

YAN Yu – ming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handicraftsme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terference of basic – level government. At first the government tended to use the market means and later political thinking reigned and the government change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This change affected the late evolution of th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had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Study on the Sino – Burmese Boundary Negotiation

GUAN Pei – feng

The Sino – Burmese boundary negotiation was held by the two independent and friendly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t that tim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at China faced was extremely severe. From 1954 when Burma firstly put forward the boundary problem to the signature of Sino – Burmese Boundary Treaty in October 1960, the whole boundary negotiation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re have at least two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Sino – Burmese boundary negotiation: the two countries' genuine desire to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boundary problem and China's magnanimousness to Burma. Spurred by the Sino – Burmese negotiation, China settled the boundary problems with a group of l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cademic Value of Manuscripts of Diaries of Zhang Jia' ao Collected in Hoover Institution

Yuan Xu – yun

The manuscript of diaries of Zhang Jia' ao collected in Hoover Institut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started from June, 1935 to October, 1979, covering the major experience of Zhang after he resigned from the position of General Manager of Bank of China and life in America in his later years. The manuscripts had salient individual features and had irreplaceable value in studying Zhang as well as financial, political and Sino – foreign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should study and collate these diaries and proofread them with pres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o as to promote relevant researches.

“Wellington Ko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are Manuscripts Pavil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the Academic Value

JIA Qin – han

Wellington Koo is a well – known diploma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ellington Koo Documents” collected in Rare Manuscripts Pavil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moder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However, there hasn't systematic study about them.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opened part of the document and rectify mistake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file catalog of Wellington Koo. It also offers advice as to how to further dig the value of these archives.

Introduction of Archives about Soong May – ling Collected in Wellesley College—Focusing on Archives of Mills

SONG Shi – juan

There are abundant archives about Soong May – ling collected in Wellesley College of the US. In archives about Mills, there were hundreds of shuttlecock letters between Soong and her university classmate Mills from 1917 to 1980. Among them, the 80 letters written by Soong to Mills and her family from 1917 to 1920 described what Soong saw, thought and felt at that time. These archives were of great value in studying Soong and her family.

(葛鉴瑶 译)